

# 台灣在地的酷兒親緣： 評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陳容（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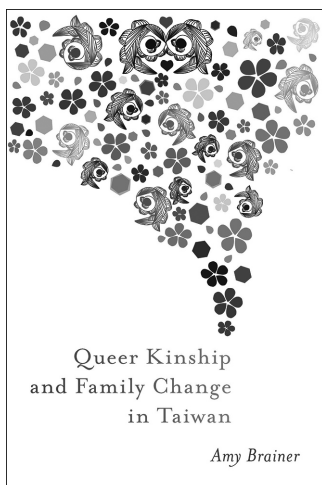
書名：*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作者：Amy Brainer

出版年：2019

出版社：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圖一：*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書封



資料來源：Rutgers University Press提供

美國社會學家 Amy Brainer 所著的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是一本探究台灣性別少數在原生家庭中親屬關係與實作的民族誌，獲得 2019 年酷兒人類學會（Association for Queer Anthropology）的 Ruth Benedict Prize。Brainer 持續關注台灣同志、跨性別及性別少數與原生家庭的互動關係，在此民族誌成書前，已有相關著作出版，如：針對教養非常規性／別認同（gender and sexually nonconforming）子女，母職如何受到社會中既存性別規範所影響（Brainer, 2015）；重新脈絡化台灣出櫃與現身論述的世代差異（Brainer, 2018）；以及探究女同志在原生家庭中，如何面對家庭壓力和負擔無償的家庭勞務與照顧（Brainer, 2017）。這本民族誌於 2011 至 2013 年間歷時十八個月的田野觀察與深入訪談，在「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協助下，Brainer 總共訪談了八十位報導人，橫跨二十至六十多歲同志和跨性別者的生命經歷，並親自走入他們的原生家庭中，參與聚餐、日常生活、親友拜訪等家庭活動。Brainer 深入報導人的家庭關係，探問家庭歷史，據此了解酷兒及其家人如何在長年互動過程中，經歷親屬關係的斷裂與維繫，以及他們如何超越西方「暗櫃／出櫃」的二元框架（Sedgwick, 1990），發展出台灣在地關係性的酷兒主體認同（Brainer, 2019: 3）。

本文以酷兒人類學會提供的獲獎緣由為始，闡述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對於台灣親屬研究的重要性。首先，獲獎專文中指出，這本民族誌的重要性在於：「Brainer 整合親屬結構與過程的模型，以此分析酷兒親緣，開拓酷兒人類學的研究範疇；並透過接合與搭建以女性（femme）為研究方法，另闢酷兒民族誌的蹊

徑。」<sup>1</sup>由此，本文將以台灣在地的「酷兒親緣」為主要概念貫穿全文。接著分成四小節，分別說明此民族誌：（一）如何論證台灣的酷兒主體在關係中具現；（二）酷兒主體如何再造性別親屬角色；（三）在父系親屬結構中，女性與酷兒如何彼此理解和結盟；（四）在研究方法上，Brainer 如何琢磨身為局內／局外人的研究者身分，同時反身性地思索自己與報導人的生命經驗。

## 一、超越「現身／深櫃」論述：關係中的酷兒主體

Brainer 認為台灣的酷兒主體認同，是在「人際往來之間」(interpersonal) 形構而成 (Brainer, 2019: 3)。誠如胡郁盈 (2017) 在研究中指出，台灣「現身／深櫃」的實踐必須經過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彼此長時間的協商和磨合，無法與西方認同政治的現身畫上等號。「人際往來之間」即是這些酷兒主體與其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而這個動態辯證的過程，創造出台灣在地脈絡的親緣形式。

---

1 此段譯自 “Announcing the 2019 Ruth Benedict Book Prize Winners” 一文，刊於 2019 年 9 月 3 日。取自 <http://queeranthro.org/2019/09/03/announcing-the-2019-ruth-benedict-book-prize-winners/>。「酷兒親緣」(queer relatedness) 為筆者所譯。承襲 Janet Carsten (2000) 提出以 relatedness 開拓針對親屬 (kinship) 分析的範疇，以超越血緣為本的親屬概念來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譯為「親緣」，同時包含著親屬、類親屬關係，以及超越親屬關係的「緣」的諸多可能。期望以此翻譯含括酷兒人類學對親屬研究的反思，也呼應酷兒批判常規化的親屬構成。選擇以「緣」來詮釋 relatedness 所蘊含的「關係／相關性」的另一巧思，則是取自黃于玲與吳嘉苓對於東亞社會中「緣」的詮釋：親近、相互理解與彼此依靠的關係，可存在於婚姻與家庭之內或是超越婚家體制的範疇 (Huang and Wu, 2018)。以此連結台灣的社會脈絡，也提供一種對於理解多元形態「(擬)親屬關係」的研究取徑。

Brainer 在第二章仔細地討論「出櫃／深櫃」現身策略的世代差距。1950 至 1960 年代出生的同志，傾向於保持家庭和睦現狀，即「既不大聲說出來，也不刻意隱藏」（Brainer, 2019: 24），他們同時考量在家庭中的親屬身分與酷兒身分，甚至更傾向於保全既有的社會網絡與家庭關係。第四章從祖父母與酷兒之間的代際關係切入，並指出「隔代關係即是社會變遷的縮影」，據此探討世代變遷中對於非常規性／別認同的態度轉變（頁 3）。在 1970 年代及之後出生的同志，多數成長於親子關係趨向親密的家庭，強調彼此共享情感，因此更有可能將向家人出櫃視為「精心策劃的重要時刻」，轉為較貼近「出櫃以展現真實自我」的論述（頁 22）。然而，對於許多家庭而言，「沉默」仍是對於溢出異性戀常規之外的性／別行為的應對方式。沉默的意涵是多重的，時而暗示著此話題的結束、迴避或是暫時擱置，然而「沒有人能夠真的掉頭離開這段關係」（頁 3），家庭關係與酷兒認同的牽絆與拉扯，繼而形構成特殊的現身模式。第五章則剖析親子關係中因性／別認同而引發的衝突與紛爭，發現部分原生家庭對於酷兒身分的不安與擔憂，來自於社會的歧視以及擔心日後生活無人相伴照料，因此酷兒以「策略的規範性」（strategic normativity）來回應父母對於同志子女的教養焦慮與不安。透過「成為好的形象的同志」，服膺理想的成功人生模板的社會期望，以迴避外界壓力，藉此說服原生家庭「當同志也可以過得很幸福」（頁 89）。

Brainer 比較不同世代間同志對原生家庭出櫃所遇到的困境與應對的智慧，處理親代與子代間如何詮釋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也凸顯將台灣酷兒身分定位為關係性的身分的重要性。承接酷兒理論從 1990 年代興起，作為批判常規性與國家制度的反抗，過去的酷兒家庭研究多聚焦於從原生家庭的出走，以及如何從親密關係或團體支

持中再創「選擇家庭」(chosen family)(Weston, 1991)。然而，在 Brainer 的書寫中，時時可見酷兒與原生家庭的關係是不斷游離又匯聚的動態過程。在台灣社會，現身不僅只是個體選擇彰顯特定的身分，而是在交纏的親屬關係中，尋覓彼此協商的可能，在往返的互動關係中「做」酷兒主體。

## 二、酷兒認同與親屬角色的再造

不同社會中存在多種樣貌的社會性與情感性聯繫形式，血緣關係只是其中一種。Carsten (2000) 提出 relatedness 作為分析框架來反思以血緣為本的親屬(kinship)研究，呼應酷兒溢出家國體制之外的離散特性，以及尋求親近、結盟的動態關係。回到酷兒人類學，酷兒作為動詞、也作為能動主體，既擾亂了既有的親屬結構，也在此家庭結構中占據一個抵抗與批判的位置。酷兒人類學結合了酷兒理論對於歐美知識體系與文化霸權的批判，已有不少英美民族誌研究關注當代性少數多元的親屬實作(Goodfellow, 2015; Lewin, 1993, 2009)。可惜之處在於，仍較侷限於針對歐美為中心的親屬研究的批判、再探與重返。本書以非常規性／別主體的認同實踐為研究對象，超越傳統親屬研究並跨出歐美為中心的疆域。

在台灣社會裡，「性別認同超越了個體的層次，鑲嵌於社會結構中的家庭位置以及其他親屬的關係之間」(Brainer, 2019: 55)。第三章透過跨性別兒女在家庭中的性別化角色形構過程，說明「家庭習俗如何打造性別」，同時揭示性少數的個體如何擾動既存的親屬性別規範，跳脫出以生物性血緣為本的親屬關係，以日常生活的關係互動實踐「性別化的家庭角色是可以協商的」(Brainer, 2019: 54)。其中一

位女跨男的報導人 Zhixiong 以家中長子的身分參加叔叔的喪禮，上香的過程彷彿向其他親屬昭示他在家族關係中的性別位置。Zhixiong 女跨男的身分實踐，既是體現做性別的能動 (Butler, 1990)，更是一系列作用於親屬角色改造的動態過程。對 Zhixiong 而言，「成為男人的認同之旅，並非止於完成性別重置手術與換證，在家庭中被賦予的角色與習俗同等重要。透過這些實作，他得以建構起他的男性氣質 (maleness)，也藉此向家人溝通他並不是女性的性／別身分」(Brainer, 2019: 54)。然而，在照顧年邁母親時，Zhixiong 同時肩負了傳統長子的責任，包含提供經濟與物質性的支持，也擔負女性照顧者在家庭中被期待的任務，諸如準備食物、親自照護母親的身體等。在穿越不同性別化的親屬角色之間，Zhixiong 「重新界定了何謂兒子的角色」(Brainer, 2019: 57)。

### 三、親屬關係中的女性與酷兒

在 1990 年代之後的人類學親屬研究，承襲 David Schneider、Janet Carsten、Marilyn Strathern 等人的親屬研究，轉而進到在地脈絡以理解多樣貌的親屬構成，並納入女性主義的視角重新檢視親屬研究裡對於自然、文化和性別的辯證關係，發掘新的關係形式與實踐以開拓親屬研究的範疇 (Franklin and McKinnon, 2002)。Brainer 以女性在性別化的親屬結構中的位置為分析方法，一方面深刻描繪出女性在異性婚姻與親屬結構中的特殊處境，另一方面則考察同志與性少數個體在家庭關係中所面臨的挑戰和協商。其報導人生活世界中的性／別實踐，回應華人家庭中父系繼承的物質結構與象徵意涵，以及難分難解的親情與責任，包含性別化的家務、育兒與照護工作如何部署於

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由此直指女性困鎖於婚姻與家庭中的處境，以及在家庭結構中的母親身分如何理解同志兒女的性向與性別認同（Brainer, 2019: 98）。

Brainer 書中一位早年相親成婚、深陷不完滿婚姻枷鎖的女性報導人 Ye Mama 自述：「男人所承受的傳宗接代的種種家庭壓力，在異性婚姻中通通變成女人的工作」（Brainer, 2019: 72）。當婚家制度中的女性面對成年女兒的同志身分，便能以自身經驗同理並勸退女兒步入以男同志為婚配對象的形式婚姻，轉而支持女兒自立而生。Ye Mama 不認為女兒在婚家制度中能夠獲得生活保障與幸福快樂，自己的婚姻經驗讓她有了體悟：「女兒無法異性成家，那又怎麼樣？」（Brainer, 2019: 73）。較年輕的同志世代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受到主流密集親職論述影響，重視代間情感交流，期盼建立起比自身成長經驗更親密的親子關係。母職被形塑成為無止盡的「愛的勞動」，傾向於將孩子的學業、感情生活與未來生涯皆視為己任，一旦發現子女顯露出「性向不正常」的種種「跡象」，母親便開始在生活中處處對子女試探與確認，並擔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至廟宇求神問卜、尋求心理治療、物色與介紹異性交往對象等（Brainer, 2019: 67, 75, 77）。一方面想扮演給予孩子心理支持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自覺而積極地「解決問題」，此雙重的擔憂與焦慮更加劇母職壓力。

Brainer 闡述女性如何以自己長年的婚姻經驗映照孩子面對婚家制度內外的兩難，並同理與疼惜非常規性／別認同子女的處境。此外，在親屬結構中不斷被賦予親職重擔的母親，更凸顯母職的責任與掙扎。Brainer 不僅書寫台灣的酷兒，也將家庭變化和連續性作為性別化現象來進行考察（Brainer, 2019: 3），並指出女性和酷兒在親屬結構中如何理解彼此且互為盟友。

#### 四、局內 / 局外人，田野裡尋路返家： 研究者反身性的思考

Brainer 之於台灣的同志與性少數社群，既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此特殊的身分提供她進入田野的利基。她來自一個行旅與遷徙的家庭，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居住過中國黑龍江、哈爾濱、長春、北京等地，爾後返美求學。因此在台灣做研究時語言隔閡少，在翻譯人員協助下得以與受訪者建立關係並交流。在中國多地生活的背景使她對東亞社會有基本的認識，對於台灣家庭的形態與家內互動雖無親身經歷，但不至於完全陌生。身為年輕的西方白人女性，Brainer 坦言受到相當多的照顧與協助，亦鮮少遇到歧視或被質疑 (Brainer, 2019: 10)。另一方面，因為身為非台灣人的「外人」，所以在對談中似乎少了一層顧忌，許多封藏於歲月中的沉重記憶，在看似親近卻又疏離的關係中轉為輕盈，得以被訴說與傾聽。

值得一提的是，在訪談中 Brainer 身為研究者，對於必須拿捏的距離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客觀，同時反思處於此關係中的相似位置——身為同志女兒，該如何面對時刻擔憂且需長時間溝通的父母？由於自身經驗產生的共感，促使她能與報導人全心地互動，也讓研究變成雙向的過程，報導人亦好奇 Brainer 如何處理與家人的關係，如她開玩笑道：「研究結束時，自己也被採訪了 80 次」(Brainer, 2019: 15)。在田野中聆聽受訪者如何與家人共同走過爭吵、不諒解與哀傷，彼此在動盪中找尋平衡點，Brainer 認為做研究也是自我回溯之旅，追溯自己身為一名同志女兒與家人之間長年的心結，並重啟建立聯繫的機會，了悟研究與生命的密不可分：「不僅鑲嵌在一起，且相互形構彼此」(Brainer, 2019: 16)。



Brainer 透過細膩的觀察與精湛的描述，直搗核心探問同志和其家人們關於出櫃——相當曖昧的、盡在不言中的、知情未言的，甚至是不可被提起的「家庭禁忌」。然而，Brainer 最大的研究貢獻亦是其侷限所在，書中精采描繪的家庭故事多數從爭執、決裂走向和解與圓滿，但有些終身被排除於原生家庭之外的生命經驗，是台灣現今許多同志的日常困頓，卻無緣在書中被看見（Chen, 2021）。Brainer 招募與篩選受訪者的策略，主要透過「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人脈網絡，此種方法較難接觸在深櫃中、無意願接收「圈內」資訊，以及偏鄉與資源較稀少的同志與性少數。此外，訴說家庭歷史本不容易，若是相對身處社會弱勢，或是因被逐出原生家庭至今仍無法走出巨大陰影的性少數個體，更難以現身於研究者面前。這些願意「現身」的同志、跨性別、性少數與他們的家人所提供的生命經歷，因為研究者本身具有反身性的檢視，明瞭找尋研究對象的侷限，而更顯可貴（Brainer, 2019: 118）。

這本民族誌重探原生家庭中的親屬關係，有別於多數同志家庭研究著墨於因親密關係開展出的「選擇家庭」（Weston, 1991），Brainer 深入探究歐美酷兒論述試圖保持距離的「家庭根源」，爬梳同志、跨性別與性少數如何在華人社會中處理酷兒身分與家庭關係，在折衝與協商過程中創造出具在地脈絡的關係性酷兒主體。透過報導人豐富的生命經歷，Brainer 亦呈現不同世代的台灣同志、性少數與原生家庭的親屬關係「酷兒化」的動態過程，並攜手打造台灣在地的「酷兒親緣」。

最後，本文欲反思性地檢視 queer（酷兒）在此書評與民族誌這兩者的適用性和未來可拓展的可能性。Brainer 一方面使用「酷兒」作為其報導人的整體性稱呼，另一方面以此為論述方法闡述主流異性

親屬敘事中鮮少被看見的關係實作。然而，書中未多加分析報導人與「酷兒」此概念／認同／標籤之間的關係。「酷兒」一詞從西方引進台灣的翻譯與意義再造，於學術領域中呈現多樣化的軌跡與論述（趙彥寧，2000），以此作為分析工具，可針對性／別常規建構、意識形態與知識生產提出相當有力的批判。然而，酷兒在 LGBTQ+ 的常民生活中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在這本相當具有潛力可回應的經驗研究中，並未處理這方面的議題。Brainer 於附錄處詳列報導人的性／別身分（包含 bi、trans、gay、lesbian、T、po 等），但在行文中並未進一步說明「酷兒」如何作為拓展親屬關係的論述工具，也未呈現報導人如何詮釋「酷兒」之於己身的意義。本文在此拋磚引玉，提出下列疑問：報導人是否知道在書中被描繪為 queer/queer family？他／她們將「酷兒」視為學術使用上的概念，跳脫二元性／別論述的現身策略，或是作為一種「新」的身分認同？以「酷兒親緣」分析台灣社會中同志、跨性別及性別少數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如何能縫合學術場域與常民生活彼此對於「酷兒」的理解，並透過日常性／別實作經驗來豐富學術論述中對於「酷兒」的認識？

## 參考文獻

- 胡郁盈 (2017) ,〈從「現身」到「關係」: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 婦女與性別研究》, 40: 107-151。doi: 10.6255/JWGS.2017.40.107
- 趙彥寧 (2000) ,〈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 207-244。doi:10.29816/TARQSS.200006.0005
- Brainer, Amy (2015). Mothering, gender and sexually nonconforming children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8(7): 921-947. doi: 10.1177/0192513X15598549
- Brainer, Amy (2017). Materializing “family pressure” among Taiwanese queer women. *Feminist Formations*, 29(3): 1-24. doi: 10.1353/ff.2017.0028
- Brainer, Amy (2018). New identities or new intimacies? Rethinking ‘coming out’ in Taiwan through cross-generational ethnography. *Sexualities*, 21(5-6): 914-931. doi: 10.1177/1363460716677282
- Brainer, Amy (2019).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Carsten, Janet (2000).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ung (2021).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17(1): 84-85. doi: 10.1080/1550428X.2021.1876551
- Franklin, Sarah and Susan McKinnon (2002). *Relative values: Reconfiguring kinship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oodfellow, Aaron (2015). *Gay fathers, their children, and the making of kinship*.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u-ling and Chia-ling Wu (2018). A new feminist biopolitics for ultra-low-fertility East Asia. In Adele Clarke and Donna Haraway (Eds.), *Making kin, not population* (pp. 125-144).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 Lewin, Ellen (1993). *Lesbian mothers: Accounts of gender in American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ewin, Ellen (2009). *Gay fatherhood: Narratives of family and citizenship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ston, Kath (1991).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陳容，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系碩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雙主修外國語文學系學士。興趣領域為醫療社會學、家庭社會學與性別研究。碩士論文 *Coming Out or Closeted: Lesbians'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in Taiwan* (2018) 聚焦台灣女同志的出櫃策略與認同實踐。博士論文主題為台灣同志的生殖醫療科技近用與成家之路，探討台灣多元家庭的日常實作，以及生殖正義與酷兒親緣在全球／在地脈絡下的社會變遷、意義移轉與關係重構。

〈聯絡方式〉

Email: jc2244@cam.ac.uk